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

No. **1** 2011

第十七期



2011年3月，复旦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合作举办“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邀请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做题为“执拗的低音”的首次讲演，共分四讲。校长杨玉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葛兆光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历史系章清教授、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分别主持四场讲演。



2011年3月10日，文史研究小型学术研究会第三十场，许全胜副研究员报告《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月31日，第三十一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生、访问学者李珊娜（Johanna Lidén）报告《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2011年1月19日，“交错的文化史”第四期研习班，邓菲副研究员报告《妙画通神——有关唐宋时期图像观念的思考》。

目 录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解题选刊

《朝天录》 郑士龙 撰	2
《朝天记地图》 郑斗源 撰	3
《一庵燕记》 李器之 撰	5
《随槎录》 卢以渐 撰	6
《热河纪游》 徐浩修 撰	8
王汎森院士“执拗的低音”系列讲演提要	10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自序	12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三十场至三十一场）

许全胜 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14
李珊珊(Johanna Lidén)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15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第四期简报	16

新书介绍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等三种	17
------------------------	----

外刊撷英	19
------------	----

博士后论坛

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以明清鼎革期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23
--------------------------------	----

Ph. D. Program in Asian Religion, Art and History	24
---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11.01—2011.03)	26
------------------------------------	----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解题选刊

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记录了朝鲜王朝与明清王朝之间士人交游、政治事件以及风俗见闻等方面的丰富史料。文史研究院从2009年5月起,着手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作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这套文献资料将于2011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刊出解题五则。

《朝天录》

郑士龙 撰



《朝天录》,木活字本,不分卷,收在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湖阴杂稿》第二册,图书编号:奎4672。

作者郑士龙(1491—1570),字云卿,号湖阴,原籍东莱,为领议政郑光弼之侄,是李朝中期馆阁出身的著名文臣。朝鲜中宗七年

(1512),在“别试文科”中以丙科状元及第,两年后由朝廷“赐暇读书”。中宗十一年担任黄海道都事期间,在“文科重试”中高中状元,转任司谏。明宗九年(1554)授职大提学,十三年再任工曹判书,十七年调任判中枢府事。明宗十九年,身陷党争的郑士龙,因从属于试图清除士林派势力的李梁一派而遭削职。郑士

龙在诗文方面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七言律诗,与同时代的朝鲜文学家申光汉(1484—1555)并称“双璧”,其主要作品均收入自编诗文集《湖阴杂稿》。

郑士龙在中宗时期曾经两度出使明朝。中宗二十九年(明嘉靖十三年,1534)和三十九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先后担任朝鲜冬至使入明,并留下了《朝天录》和《甲辰朝天录》两部诗稿(后者内容简略,仅存诗六首,收入《湖阴杂稿》卷三)。郑士龙还多次负责在朝鲜国内接待明朝来使。正德十六年(1521)唐皋、史道,嘉靖十六年龚用卿、吴希孟,十八年华察、薛廷宠,二十五年王鹤等人出使朝鲜,郑士龙都曾参与迎送接待工作,并留下大量酬唱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编入《皇华和稿》和《宾接日录》两集,收入《湖阴杂稿》卷三、卷六)。

本书收录的《朝天录》(又称《朝天日录》),是嘉靖



十三年(1534)郑士龙以冬至使身份出使明朝时所作的诗集,郑士龙晚年自编八卷本《湖阴杂稿》,1573年活字印刷发行,该诗集即收在其中第二册。嘉靖十六年出使朝鲜的明使龚用卿(1500—1563,撰有《使朝鲜录》),为本集所作题记云:“云卿於嘉靖甲午冬,奉其国王之命入朝贡於京师,日纪其道里之所经,目击中国之盛,凡有所触,辄发为声诗,故集以‘朝天’名也”(龚用卿:《题郑判书〈朝天日记〉》,《湖阴杂稿》卷八附录)。集中诸诗大致按照出使所经地点的先后编排,内容以吟咏沿途风物见闻为主,对燕冀民俗有较为详细的描写。例如《烧香的》描写地方民众建旆鸣锣、结队赶赴东岳庙烧香的盛况,《晚出通州城》描绘通州婚嫁风俗以及歌伎在酒店前“群集弹三弦子作场”的情景,《观鞦子》记流落广宁的蒙古民众,笔调均甚为细致。郑士龙出使明朝,正当嘉靖皇帝“制礼作乐”热情未减之时,因此集中不少诗作均与这一政治背景相关。嘉靖九年世宗命孔庙增建启圣祠、易塑像为木主,十年下令分祀天地、以冬至日祭天于南郊,十一年新修历代帝王庙落成,上述一系列重要的礼制更革,在郑士龙诗中均有反映。例如《国子监》云:“衮袍华冕塑真形,以粟如今妥素灵”(小注:“庙宇悉重修,塑像皆易木主”),

《冬至祀天》云:“长至郊天缛礼新”,《历代帝王庙》云:“祀从圣祖修来远,制到明时礼益尊”等等,都是嘉靖礼仪新制的写照。郑士龙对冬至颁历、郊祀庆成宴等皇家仪式,以及明廷迎送朝鲜使者的下马宴、上马宴等外交礼仪,也都有细致的描绘。郑士龙留居北京期间,与中国士人有所交往,而且对明朝士大夫观感颇佳。朝鲜使臣此行获得了礼部尚书夏言(1482—1548)的接待,郑士龙评价这位嘉靖重臣“风采端凝,不无别后之想”;他和嘉靖壬辰科状元、时任翰林修撰的林大钦也有往来,归国途中曾作《沙河梦林修撰大钦》(按:林氏籍潮州,郑诗误作浙江),对林氏的儒雅风度向慕不已。

郑士龙是朝鲜前期馆阁文臣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朝天录》内容涉及中国北方民俗、嘉靖礼仪改革、明朝外交礼制等众多方面,对于中朝关系以及明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均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另外,《朝天录》中还多次提到在途中旅舍、庙宇等处所见到的“诗板”,这些记载对于考察古代诗歌的传播途径,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徐廷文(韩国古典翻译院 责任研究员)

张佳(复旦大学历史系 博士生)

《朝天记地图》

郑斗源 撰



《朝天记地图》,笔写本,不分卷一册,藏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图书编号:B16I—0020。

作者郑斗源(1581—1642),仕朝鲜仁祖朝,字紫元、丁叔,号壶亭、枫岳山人,原籍光州,光海君

八年(1616)增广文科丙科及第,因党属“西人”派,庙堂见弃,徘徊于地方微职,以“仁祖反正”(即1623年

废黜光海君王位,由绫阳君李倬即位,是为仁祖)为契机方得重用。次年任管饷使,为驻军皮岛之毛文龙输送粮草,“丁卯胡乱”(指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皇太极侵入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之盟和平壤誓约的事件)之际任转饷使,掌临津江粮草运输事,后历膺江原道观察使、开城府留守和中枢府知事等职。其叔父郑云湖(1563—1639)于仁祖三年(1625)出使明朝之际,郑斗源曾随行,并以此资历于仁祖八年(1630)任陈慰使经海路再次出使明朝,《朝天记地图》正是此次使行之记录。尤可贵者,郑斗源于登州面晤西洋教



士陆若汉,蒙惠赠“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物(《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25,仁祖九年七月甲申),并携回利玛窦《天文书》、《职方外纪》、《西洋风俗记》、《天文图》、《红夷炮题本》等书籍(奎章阁本《国朝宝鉴》卷三十五,仁祖九年秋七月,页17-18)。这是朝鲜与西洋见诸史籍的首度接触,无疑是一段历史佳话。

《朝天记地图》正文非按日期而是以行程展开记述,途中凡所经岛屿、州县、驿站皆附插图及图说,共分九章,由《石多山图》(平安道平壤府)、《椴岛图》、《车牛岛图》(属朝鲜)、《小獐子岛图》、《大獐子岛图》、《鹿岛图》、《石城岛图》、《长山岛图》、《广鹿岛图》、《三山岛图》、《平岛图》、《龙王堂图》(明朝辽东半岛)、《皇城岛图》、《鼉矶岛图》、《庙岛图》、《登州图》、《黄县图》(属登州)、《黄山驿图》、《朱桥驿图》(掖县)、《莱州图》、《灰埠驿图》、《昌邑县图》、《潍县图》(属莱州)、《昌乐县图》、《青州图》(青州)、《金岭驿图》(属益都县)、《长山县图》、《邹平县图》、《章丘县图》、《龙山驿图》、《济南府图》、《济河县图》、《禹城县图》、《平原县图》(济南府)、《德州图》、《景州图》、《阜城县图》、《富庄驿图》、《献县图》、《河间府图》、《任丘县图》、《莫州图》(河间府)、《雄县图》、《新城县图》(保定府)、《涿州图》、《良乡县图》、《帝京图》(顺天府)等四十七幅图画及图说构成。图说所记各地人口、沿革、地势、风俗、人物、故事、遗迹等情况,多源自《明一统志》,且往往以“臣见”或者“臣闻”等语起首,记作者之亲身见闻,以备朝鲜国王咨访。

正文之后所收《开路题本》、《正月六日礼部呈文》、《二月十九日》、《三月十七日礼部大堂呈文》、《军门前呈文》、《军门前再呈文》、《军门前又呈文》等七篇

公文,是郑斗源向明朝上奏要求变更航海贡道的重要原始文书。因明朝丧失辽东之后,朝鲜改海路经皮岛至登州上岸向明朝派遣使节,但崇祯二年(1629)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1584—1630)为牵制坐镇椴岛的毛文龙(1576—1629),向崇祯帝进言,令朝鲜使节改由觉华岛上岸,由辽西走廊入京。但是觉华岛航线远较登州航线危险,曾发生过使节遇风溺毙的事件,是以郑斗源受命出使,要求恢复原有登州贡道。

《朝天记地图》正文形象地记载了朝鲜使节前往北京的登州“贡道”,与记载觉华岛航线的金堉所撰《燕京日录》互为参照,后者于崇祯十四年(1636)出使明朝时,是经皮岛绕过辽东半岛至觉华岛登陆。而正文之后所附公文,详细记述了郑斗源为达成使命与明朝有关部门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史料价值极高。值得注意的是,起初郑斗源对于恢复登州贡道抱有很大希望,因为他抵达北京时,袁崇焕因“纵贼犯皇城,且擅杀毛文龙”之罪而被诛杀,兵部迫于礼部有意怀柔属国的压力,一度承认“改觉华系罪督师私意”,但由于登莱巡抚孙元化呈文兵部,报告当年四月自后金投诚明朝的皮岛军官刘兴治发动兵变最终被诛一事,使得崇祯听取了兵部意见,以“近方诘戎靖海,严海防”为由,下旨令朝鲜使臣“暂从觉华……勿以险远为辞”,使得朝鲜使节最终没有完成出使使命。不难看出,这些公文对于了解明朝后期围绕具体决策而展开的党争,以及明朝内政与外交之关联性亦不无帮助。□

曹苍录(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陈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博士后)



《一庵燕记》

李器之 撰



《一庵燕记》，笔写本，五卷五册，藏在韩国银行知识情报室，图书编号：O 990。

作者李器之（1690—1722），字士安，号一庵，原籍全州（今大韩民国全州市）。其父为肃宗年间“老论”派大臣李颐命（1658—1721），亦著有《燕行杂识》等。李器之

少负文名，肃宗四十一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进士试中考取第一，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肃宗逝世，李颐命作为李朝朝鲜的告讞正使前往北京，李器之以子弟军官身份随行。因李颐命主张对后来成为英祖的延礽君进行“世弟册封”，在景宗元年（1721）的“辛壬之祸”中被“少论”派铲除，李器之牵连受审，死于狱中。英祖元年（1725）平反，被迫封为司宪府持平。有《一庵集》传世。

本书即1720年李器之随行使清的日记，写本收藏于韩国银行知识情报室，曾收录于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所编《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卷首为使团成员名单，及一个自庚子（1720）八月十八日起至九月初七在中国境内二十天简要行程表，此后五卷，每卷正文之前，列有本卷内所含日期、地点，如同目录。正文中，每日均标注日期、地点、出发、吃饭、住宿、途经驿站情况、里程数以及所见所闻，自“七月二十七日辞朝”至“八月十七日留义州”即在朝鲜境内部分，较为简略；自“八月十八日离开义州到达九连城”起，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渡江抵义州”，即在中国部分，格式齐整，排布清晰；此后，二十四日后至正月初七入京即回到朝鲜部分，则又仅列行程。第五卷卷末收录其子李凤祥于英祖三十五年（1759）所撰《燕行日录序》，《序》中说明

了李器之去世时，“纪行之书未及脱稿，缺漏甚多，与中州人士问答诸纸，并皆散帙，无以参互考证，故只依草稿，写成四卷”的情况。

据说，李器之在1712年读了金昌业（1658—1721）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后，就有心执笔写一本不亚于金昌业的燕行记，所以当其父亲作为告讞使出使清国的时候，便欣然参加使团赴北京，他子弟军官的特殊身份，为他不时离队独游提供了条件。他继承前辈燕行记的写法，一路对中国各城市的由来和历史沿革、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宗教氛围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注意与自己之前阅读过的燕行录和想象中的中国进行对比。如九月初二《游闾山日记》中就记载，其鞍囊中有在朝鲜时就抄录的金昌业《燕行录》中《闾山记》和月沙先生的《闾山记》，“遂取出左手，到处批阅，参互考证，一一按数”，并得出“大抵稼斋所录，凿凿相符，无一不合，月沙先生记多相左，亦有不可晓者”的结论。而他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则主要集中在诗文酬唱、谈论科举及搜求书画上。如曾为金昌业兄弟《金氏联芳集》作序的杨澄，也曾作《李先生游燕京序》一文赠之；而李器之拜访赵华，则辨别出赵宅一幅唐伯虎的山水楼台画实为仇英的作品，让赵华十分佩服。晚年主讲贵山书院的学者陈法，其时仅二十八岁，在京为翰林院检讨官，住在宣武门外蔡市胡同，在与他的笔谈中，李器之不仅与他互赠诗歌，讨论崔致远故事及杜诗朝鲜版本，还了解到中国最好的杜诗注本是钱谦益《杜诗笺注》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并四处搜求购买后一种；而陈法向他讨要“东文选”，李器之则将《挹翠轩集》中涉及朝鲜国事的序文及碑状全部撕下后赠之，并指出这部诗集中的诗“语多天成，可与后山、简斋相颉颃”，如果假以时日，甚至可以“不在东坡之下”，这不但有助于了解中朝文人对于文学的品鉴标准，也可以看到



朝鲜使节对于异国的警惕与戒备。另外,委托赵华寻找画师为《本草纲目》上的物品作“细密画”,寻访算命高人蒋晨等,都是两国文人交流史中很有趣的内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器之相当关注西学。在北京期间,他除了观览庙会、象房、钦天监等地之外,更多次访问当时北京的天主教堂。朝鲜燕行使节访问天主教堂在18世纪最为频繁,但他们大多只访问四大教堂中的南堂。其中,1765年出使的学者洪大容(1731—1783)最负盛名,曾被视为唯一访问南堂和东堂者。然而,李器之在洪大容之前,即遍访南堂、东堂、西堂,更与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0)、汤尚贤(Pierre de Tartre, 1669—1724)、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2—1741)等传教士有往来,十分值得注意。李器之曾被洪大容评为见识卓越,而且精通西洋绘画知识和天文观测机械,他对西学的关注正集中在这些方面,此外对教堂壁画、版画、地图、天主像、自鸣钟、千里镜、浑天仪、葡萄酒、鼻烟等物,也都有详细记录,这部分内容曾以《西洋画记》和《浑仪记》之名单独收入其文集中。在本书中可以看

到,他在北京时,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密切,不仅时常互访、书信往来,互赠特产,在西人杜德美病故时,还寄书吊唁,并在文中记录了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特殊葬俗,为了解西方传教士在京活动及交游的情况提供了资料。

此外,虽未有直接接触,“大鼻鞑子”也曾给李器之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与西洋人谈话中所言“拉儿素者即大鼻鞑子”、“与西洋接境、语言相通”、“他不是朝贡,只因买卖皮物而来,自长城外蒙古地方,入居庸关,宿清河县,而入北京一百三十人”等情况,康熙末年的大鼻鞑子应为俄国使节和商人。书中不但记录了他们的相貌、衣着、武器,还描述了他们在中国占据朝鲜使节所居玉河馆、横行市井而清兵不能禁、朝参由西洋传教士翻译、上殿顶撞皇帝亦无罪等情形,其中虽不无臆测、想象和偏见,仍可从侧面展现出康熙朝俄国使节在清状况,及朝鲜使节对异国的关注。□

申翼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人文学部教授)

吴湛(复旦大学中文系 硕士生)

《随槎录》

卢以渐 撰



《随槎录》,笔写本,不分卷一册,藏在韩国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图书编号:古811.5 ㄴ69 入。

作者卢以渐(1720—1788),字士鸿,号楸山,原籍万顷。其父卢彦骏武科出身,有二子卢以复、卢以渐。卢以渐跟随族兄卢以亨学

习,朝鲜英祖三十二年(1756年),他以37岁“高龄”考中进士,之后仅担任过长陵参奉和汉城府的西部奉事

等低层职位,应该说其政治生涯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在家族史上,卢以渐的五代祖卢世得生有卢应院、卢应暉、卢应皓,此三兄弟在“壬辰倭乱”(即丰臣秀吉派兵侵入朝鲜的事件,日本称为“文禄之役”)时追随老师赵宪从事义军活动,其中卢应暉和赵宪一起战死在金山,其余两兄弟勉强保住了性命。这一段家族史对卢以渐的思想成长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当在壬辰倭乱中给予朝鲜援手的明朝被清朝取代后,因为追崇先祖,卢以渐产生了“尊明排清”的思想,这一点在其撰写的燕行录中亦有所体现。根据《万顷卢氏世谱》记载,卢以渐有遗稿二十一卷,另据记载,他与当时以诗文闻名



的申光河(1729—1793)素有往来,可推测他在诗文方面当有一定造诣。

朝鲜正祖四年(1780年,即清乾隆四十五年),卢以渐以上房裨将的身份参加谢恩兼进贺使团前往清朝,此次出使的目的之一是祝贺乾隆帝七十大寿。使团一行五月二十五日从汉城出发,至十月二十七日返抵汉城,其间在北京、热河两地停留约四十五天。卢以渐将前后五个月的出使过程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记录,详细地记载了每日的见闻和获取的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书名题为《随槎录》。这种按日期记录日程和见闻的叙述方式,基本上是模仿被奉为燕行录教科书的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的写法。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部著名的燕行录——《热河日记》的作者朴趾源(1737—1805)也是该次使行队伍中的一员,而《热河日记》记录的也是这次使行期间发生的情况。就此,我们可以将《随槎录》与《热河日记》做比较阅读,其研究价值或将更为明显。比如,《随槎录》处处充斥着“尊明排清”的思想,这就与朴趾源重视向清朝学习的观念形成对比;《随槎录》按日期详细记录了出使的全部过程,《热河日记》则略去了从汉城到义州、从北京回汉城的部分日程,而更为详细地记载进入中国以及停留北京期间的事宜,两者互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次使行的全貌。

《随槎录》作为使行全过程的记录,和多数同类燕行录一样,记载了诸如领赏、下马宴、上马宴等中方接待情况,尽管是一些常规的记录,但大量描述细节仍是其所长。除此之外,《随槎录》中不乏一些比较稀见的材料。比如八月二十日的记录中,就有乾隆如何礼遇班禅额尔德尼的详细情况,而卢以渐也听闻,乾隆礼遇班禅大概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借其镇摄蒙古各部,“蒙古四十八部最为强大,乾隆畏之,待之甚厚,累与连婚,而患之弥甚,闻班禅最为蒙古之仰慕,特为招致,要藉其灵以镇蒙人”;二是佩服其神通,班禅“尝与乾隆对坐饮茶,忽掷茶□于地,乾隆□而问之,答曰某

州某里方有火灾,绵延数千家,故以此救之,其后果自某州报云,某日某时某里失火,忽有骤雨注而灭之,乾隆以此益敬信云”。同时,书中对班禅外貌形象也有细致的描述。此外,卢以渐还记载,乾隆让朝鲜使臣往见班禅,使臣“辞不得已而往见”,并得到班禅的一句“永远恭顺自然获福”的赠语,颇值回味。卢以渐在此节中还记录乾隆赏赐朝鲜使臣大量物品,但使臣“辞而不受”,而礼部“累加恐喝”,“故不得已受之”的情况。这些材料为评估乾隆时期的中朝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其中是否带有卢以渐个人的感情色彩似尚需辨识。另外,《随槎录》中以较长篇幅记载的卢以渐、朴趾源二人与一位名叫博明的员外的对话也值得注意,其中对儒家的孔、孟、程、朱、陆、王学说都有展开论说,甚至对孔孟及二程后人的情况也有述及,这对我们了解当时儒学的情况亦有参考价值。从《随槎录》中还可以看到,卢以渐和朴趾源经常一同会客、出行,因而从卢以渐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关于朴趾源的材料,特别是在结尾附录的“西馆问答序”中,对朴趾源的描述如“长身、大面、眉秀、髯疏,有古人之风仪”、“性嗜酒”、“弹西洋琴”等等,都是不多见的材料。我们还发现,卢以渐和朴趾源一同出行游览的过程中,往往是卢以渐为朴趾源提供有关名胜古迹的背景资料,由此可见卢以渐虽对清朝抱有成见,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是颇为关注和谙熟的,而这恰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保守的朝鲜士人对中国所持的微妙心态。

总体而言,这一部《随槎录》不仅提供了丰富而细致的有关清代中期中国情况的珍贵史料,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明清易代一段时间之后,朝鲜士人观看中国时心态的微妙变化,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实际状况,尤其是其中思想层面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陈在教(成均馆大学汉文教育科 教授)

朱坤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博士后)



《热河纪游》

徐浩修 撰



《热河纪游》，笔写本，四卷四册，藏在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编号：想白古 915.2—Se61y。

作者徐浩修（1736—1799），字养直，号鹤山，原籍达城（属今韩国大邱市），其父为在朝鲜英祖朝任大提学的徐命膺。徐浩修于英祖四十一年（1765）文科状元及第后，先后在司宪府、弘文馆、承政院、奎章阁、掌乐院、观象监等机构任职，后又历任六曹（相当于中国“六部”的概念）判书、汉城府判尹，还曾一度被外派为水原府使、江华留守、湖南观察使、平安道观察使、咸镜道观察使，其历官场三十余载，可谓朝鲜正祖朝（1776—1800）的一位重臣。徐浩修文学造诣深厚，曾参与朝鲜官修典籍《文献备考》和《弘斋全书》等的编纂，并有《海东农书》和《私稿》等著述存世。

徐浩修曾于英祖四十一年（1765，清乾隆三十年）和正祖十四年（1790，清乾隆五十五年）两次出使清朝。前一次他是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出使（安排每一届新科状元出使面圣，是朝鲜向中国派遣燕行使的一种惯例，有接收上朝检阅封赏之意）。《热河纪游》记述的是其第二次出使的情况，这一年适逢乾隆八十寿诞，正祖以昌城尉黄仁点为正使、礼曹判书徐浩修为副使、弘文馆校理李百亨为书状官组成万寿节进贺使团前往贺寿。在归国两年半之后（1793年），徐浩修在鹤山脚下开始撰书，按日记录了正祖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向国王辞行起至十月二十二日返抵朝鲜复命的燕行详情，并以“到热河初见天子”将书命名为《热河纪游》。

《热河纪游》体例严谨、规整，文风古朴，明显区别

于朴趾源《热河日记》一类散文体的燕行录。这或许和正祖朝力推“文体反正”（倡导恢复六经古文文体，反对散文、小说类文体，实为保守思想对新兴实学思想的抑制），与徐浩修浸淫官场多年不无关联。全书卷首是徐浩修题写的自序《热河纪游序》，接下来便是分为四卷、以日系事的正文部分。

第一卷题为“起镇江城（位于今辽宁省丹东市）至热河”，记五月二十七日拜别朝鲜国王至七月十五日抵达热河的旅程。徐浩修途中每经一名川要地，皆作考证，详辨籍载正误。如途经九连城，便以金史、高丽史参证，说明《清一统志》所载九连城之误。每经一军事重地，则详载其四周范围、城门位置以及守军人数，在当时或有侦探之意，在今日颇可资考究乾隆朝时期边境守兵制度。徐浩修和一般的朝鲜士大夫一样，也关注明清鼎革之事，如在经过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学士（“丙子胡乱”中被清军处决于沈阳的朝鲜主战派）“成仁处”时，感慨“以亭林、榕村诸先辈之好奖节义，亦不曾语到三学士事”。而此前途经辽阳，在论清朝占据辽阳之举时又称其为大统之基，既对明朝有顾念，又承认清朝的大统，可见朝鲜士人对明清鼎革的复杂心态。此外，该卷中还录有朝鲜呈送清朝的公文和礼品明细等。

第二卷题为“起热河至圆明园”，记七月十六日在热河停留至二十六日抵达北京的事项。除描绘途中所见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外，主要内容是记载在热河行宫受宴的详情。此次朝鲜出使专为庆贺乾隆寿辰，乾隆帝于热河设宴招待各国使臣，徐浩修曾参与其中数次宴席，故细述相关礼仪典制，包括就宴班次、筵宴次数、撤宴后设茶等事，其中记到就宴班次以朝鲜为首，次为安南，次为南掌，次为缅甸，次为生番，依次坐于西序，显示了清朝与各藩属国的亲疏。徐浩修还笔录宴中与



清朝大臣的交谈内容,多关乎学术、政局或掌故,如记吏部尚书彭元瑞问《古文尚书》真本是否唯朝鲜有之,反映清朝士大夫对于《古文尚书》及其流传的看法;又记安南国王阮光平生平及取代前国王黎氏的过程,以及阮光平贿赂福康安以求庇护的内情,其中似还涉及福康安与和珅的恩怨等,可见清朝内政与外交之错综关系。此外,该卷七月二十六日记载徐浩修往观“利西泰墓”(即利玛窦墓),其中有对墓地的详细描述、对利玛窦事迹的评价,以及徐浩修写的“告利西泰墓文”。

第三卷题为“起圆明园至燕京”,是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停留北京期间的记载,主要记录万寿节的祝贺仪式以及与清朝官员、各国使节、传教士等交往的情况。比如徐浩修记录了和珅与阿桂的不同作风,奉旨颁赏时和珅“必手自点检,口呼名授之”,阿桂“则置黄函于前,使郎官通官等呼名授之”;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耳闻,品评和珅、福康安二人,认为“和则极躁妄,福则极贪鄙”,与一般认为和珅贪、福康安狂的看法刚好相反。此外,徐浩修在京期间与蒙古、安南使节颇有往来,并留有记述;又与传教士汤士选、索得超有交

往和酬赠,如日记八月十九日收录了汤士选的来信,八月二十二日则有与索得超互致书信、馈赠的记载。

第四卷题为“起燕京至镇江城”,记载九月四日离开北京至十月十日抵达镇江城的路程,以记录山川景致、古迹名胜、风俗民情为主,最后则附记了十月二十二日于重熙堂觐见正祖复命的情况。

《热河纪游》的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徐浩修作为一名学养深厚,通晓中、朝典籍的朝鲜士人,在途中的大量考据工作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徐浩修的细致观察和记录,提供了大量关于乾隆朝后期上至朝廷礼制、周边外交、官僚政治,下至士人思想、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的宝贵历史资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徐浩修本人对西学的兴趣,他的日记中还留下了众多关于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以及西学西艺在华传播的珍贵史料,值得研究者关注。□

曹苍录(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於梅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博士后)

王汎森院士“执拗的低音”系列讲演提要



2011年3月,复旦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合作,启动了“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邀请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为首位讲演嘉宾,做总题为“执拗的低音”的系列讲演。讲演共分四场,内容主要是王汎森院士对史学视野的一种再

思考。

近代中国,当新的思想典范逐渐占据历史舞台时,便有不少带有传统色彩的学术论述被推挤到历史边缘,这些思想、论述、视野及方法,值得重新加以检视。“执拗的低音”借用了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词语,但不是要复古,而是回到各种论述的起点去重加审视,了解是不是有获得一笔新学术资源的可能。

第一场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本讲包括若干主题,如重新检讨近代中国激进思想下各种互相竞争的论述、对“史家的逻辑”与“事件的逻辑”的思考、对历史人物“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思考等。

在这讲中,王先生分享了其近代思想学术史的

思考路径。首先,他强调在每一个历史分歧点,学术、思想上会分出“主音”与“辅音”(即所谓的“低音”),在其后的发展中,主音逐渐成为主流,辅音随之消逝,从而在分歧点前后产生“消耗性转化”。其次,许多逝去的“辅音”往往正是“转化”前的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要以“重访”(revisit)的方式,对历史分歧点重新加以理解,以探明在“主音”语境下显得荒唐可笑、难以理解的“辅音”之内涵,并依此对“消耗性转化”有更清晰的体认。他阐明自身并非“复古派”,而是寄希望于对“低音”的重访,为当下的学术、思想、生活提供一种历史的精神资源。

最后,王先生进一步补充了“低音”的其他表现形式及由此引发的反思。他从“由古及近追溯历史”与“依历史发展顺序观察历史”之间的差异,提出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宏观判断。他认为,在近代思想领域中,犹如两列火车对开、形成两股相对的洪流的,一种是由学习和借鉴西方而建立起的“进步”、“发展”的强大思想,另一种则是对故去思想的坚守与再阐发。但在后代的历史纂述中,前者逐渐成为“主音”并发展成为“后见之明”,后者则渐被忽略或不被理解。

第二场 “心力”与“破对待”

本讲以《仁学》为例,说明新奇的自然科学概念如



何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语汇、“心力”与主观能动性的塑造以及对宇宙道德共同体的追求,并说明新的价值追求如何改变了学术的视野。

以谭嗣同的《仁学》为例,王先生探讨了“主音”的多个层面。首先分析了谭嗣同的思想源流和陆王心学、《治心免病法》、“以太”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其次,他认为谭嗣同提出以“心力”来“冲绝网罗”,破除传统中的“对待”(即以亲疏、尊卑等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是在试图以“以太”的世界观和“心力”的巨大能动性去“溶解”宗法社会,形成“道德的乌托邦”。这种思想对其后的革命亦有深远的影响。由此,近代思想中出现了不分亲疏、尊卑的思想倾向,并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成为近代思想的“主音”之一。

第三场 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近代的新史学强调,史学研究不应受传统道德仁义的束缚。历史与道德、历史与伦理成为一种过时的关怀。本讲探讨的是王国维“道德团体”说的观念来源,以及“历史”与“伦理”、“历史”与“意义”等相关问题。

近代史学发展中有两个矛盾而并存的面向。一方面是受西方、日本影响而建立起的进步史观与纯粹的知识观(主张学术与道德、政治的分离,提倡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是将历史与伦理、道德、政治相连的传统中国史观。两者不仅在王国维身上矛盾地共存,亦显示出近代学术、思想领域里中西的紧张关系与巨大张力。

王先生首先指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道德团体”一说不同于他的其他研究。在王国维金石学的研究中,展现出的是理性、客观、纯粹的知识观,而“道德团体”一说则是王国维将伦理、政治融入历史这一传统史观的彰显。其次,王先生追溯了“道德团体”概念的来源,描述从德罗伊森(Droysen)、浮田和民到梁启超、王国维的流传过程。同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认识不断与道德、政治剥离,表现出中国近代史学进化

史观与纯粹知识的主导力量。最后,他通过将王国维与柳诒徵、梁启超进行对比,再次凸显了王国维将“两列火车”捆绑而产生的矛盾与悲情,并以此发掘出近代学术中“主音”与“辅音”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第四场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这一讲围绕蜀中学者刘咸炘的《推十书》,既检视“风”这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亦重访处于历史论述边缘非主流学人的思维世界。

“风”是刘氏论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不仅在于风俗之重要,更在于“无不有风”,大到政治、人才的选拔,小到器物装饰无一不在“风”中。故不同于梁启超“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定义,在刘咸炘看来,史学最重要的任务乃是“察势观风”。王先生首先追溯刘咸炘之思想渊源,一为龚自珍,一为章学诚。又通过《推十书》对旧史体的批判和对“风”的细致区分来分析其“观风”史观:刘氏认为写“风”需纵横两笔,纵即“时风”,横即“土风”,而旧史体中断代使“纵”受限,纪传使“横”受限,史目则设置了格套,都使人们无法看到历史风势之变化。

此外,王先生列举了此史观对刘氏之影响以及刘氏其他的史学观点,亦指出刘咸炘并不排斥西洋史,且也受新史学之影响,但其与近代新史学之不同在于,新史学观念多从外而来,而刘咸炘则更多地通过检讨旧史体例,从旧史内部寻找新生命,重新提出自己的想法。

刘咸炘虽为保守主义者,但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我们过去对这类主流之外的保守主义者了解实在不足。通过对此类个案的探讨,或可见人文之多样性,而不至于“黄茅白苇,一望皆是”。

王汎森院士此次系列讲演将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结集出版。□

钱云、诸颖政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自序

葛兆光

2011年2月,葛兆光教授《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繁体字本也于2011年3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这本书讨论的是“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最初,我并没有想过要写这么小的一本书,来讨论这么大的一些问题。自从进入学术世界以来,我大都是在古文献、宗教史、思想史或文学史等古代中国的具体研究领域中打转,尽管也不时关注西洋东洋的新说,偶尔涉足近世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和文化,有时也忍不住发一些高屋建瓴的议论,但落笔成文的时候,总是觉得想要“言之成理”还是先要“持之有故”,没有文献支持好像理不直气不壮,凭理论说大问题仿佛空口说白话,总是心里没底。

可是,在这些年的研究中,越来越觉得绕不过这些大问题。

2000年秋天,当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公寓中写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最后一章之后,原本下定决心

停笔好好喘一口气,正如我在《后记》中说的,这八年间为了写这部书,“几乎是已经精疲力尽”,所以,总想找机会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但没有想到的是,从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问题,又带来一种急迫和焦虑。《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仿佛像“谶言”,迫使我不得不进入1895年以后。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诗经》)、自信“允执厥中”(《古文尚书》语)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便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02年,我写了《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已收入本书,这是本书中完成最早的一章),在这一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记得当时主持这一场发言的是林毓生先生,和我同场的是日本的子安宣邦教授。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标题上察觉到,这篇带有论辩性质的文章是有感而发,所谓“有感”无非两方面。一方面,就像上面说的,写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之后,对进入世界的现代中国思想产生了太多的想法,原来想写的第三卷即《1895—1989年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变迁》,因为资料浩瀚,更因为问题太多而中辍,不得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重新检讨。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界,对于“中国”、“亚洲”的论述升温,并且波及中国大陆学界,这些没有经过检讨就使用的地理概念,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什么意义中,可以当作“历史世界”被认同和被论述?这个问题需要有人进行回应。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的回应,而是从历史脉络和文化立场上进行的回应。

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异域学界,我自然可以在神州做袖手人,不过,一百年来“西潮又东风”(这是我另一本书的书名)始终在波动(或拨动?)中国学界,有的话题在国内也常常脱了西装换马褂,或把蟹行换了汉字,不止是进入而且还发酵,重新甚至随意地解释着历史,这究竟是“格义”还是“硬译”?我很难判断。因此,那几年我便不得不进入这些问题,同时也因此开始从朝鲜、日本文献进入所谓“东亚史”领域。特别需要一提的是,2006年底,我从北京的清华大学到上海的复旦大学任教,受命组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我把

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和思索,变成了新建的文史研究院的课题和方向,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评的中国学”等等课题的研究,这本书所收录的各节,多数都是这几年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书名“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作“天之中”的洛阳一带。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因为古代的“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到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意思似乎是“墨守”。这新旧两重含义,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最后,可以顺便说到的是,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因为六十年前胡适也曾在这里短暂“挂单”(任东亚图书馆馆长)的缘故,便常常翻看胡适的书,今天,很偶然地看到他1929年写的《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最后两句是“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不免特别感慨,使用它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2010年4月
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 (三十场至三十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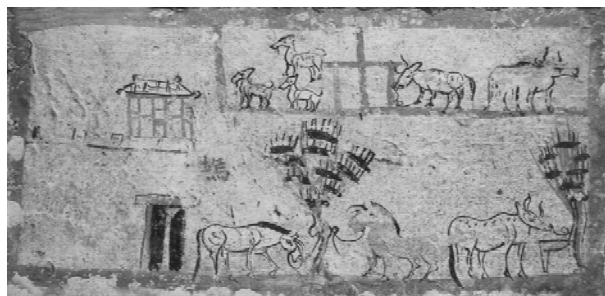
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许全胜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十余年来,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和征集了文书、墓志等珍贵历史文献五百余件,后结集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这些文献以世俗公私文书为主,内容十分丰富,对研究中古时期历史、制度、民族、社会、文化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除了社会文书之外,还有中国传统典籍,如古本《诗经》、《论语》、《急就篇》、《千字文》等,另外出土了不少佛经残篇。汉文文献外,又有少量粟特文文书及藏文与婆罗谜文木简。本报告主要探讨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坞堡的问题,并就文献中反映出的胡姓家族及胡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深化对中古时期西域文化的认识。

2006年10月吐鲁番鄯善县洋海一号台地四号墓(即赵货墓)出土纸鞋所拆出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是现知中国最早的纸质户籍样本,对研究古代户籍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而其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的两种坞堡也值得关注。其中一种以人名命名,如“孙裔坞”;对于

另一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及研究论文原释作“埽坞”,经考证应作“巢坞”。巢坞与巢车一样,具有军事瞭望功能。在东汉魏晋时期许多考古资料中可见坞堡中建有用于瞭望的楼橹等高台建筑的形象,这些坞堡当即《建元籍》所谓的“巢坞”。《建元籍》的发现对考古资料中这类坞堡的定名具有重要意义。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壁画中还可见到坞堡周围有田地、桑树,并有家奴耕地、扬场和妇人采桑的场景,有的坞堡中还有果园,这与《建元籍》中“巢坞下桑二亩”、“巢坞园二亩”的记载十分吻合,反映了十六国时期西部地区



嘉峪关墓葬画像砖



农桑经济的基本状况。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公布了一批当地西域胡人家族墓地所出的墓志,文书中也可见到许多胡人的名字。这些文献所见的胡人中,最引起学者关注的自然是粟特人。而高昌故城东北部巴达木地区白氏、康氏家族墓葬区以及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地

的发现,不仅是对吐鲁番安乐城出土430年《金光明经》写本题记所示高昌城东有胡天祠的有力支持,也可看出六至七世纪高昌地区粟特移民的汉化程度有日益加深的趋势。除了粟特人,报告还分析了吐鲁番文献中出现的天竺人、鲜卑人、铁勒人的情况,并对若干胡姓及胡名进行了考证与构拟还原。□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李珊珊(Johanna Lidén)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宗教系博士生、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研究晚明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学者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日渐增多,在西方仍然较少。狄百瑞教授(deBary)《明代思想中的个人与社会》(1970)中关于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讨论——题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章,仍然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的英文文献。

狄百瑞虽然质疑“个人主义”的概念,但依然加以沿用,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提法。在他看来,王艮思想中具有歌颂自我的倾向。这种对自我的歌颂,来源于王艮的明哲保身论。王艮说:“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这也跟他所提出的“安身立本”一说有关。不过,王艮的思想虽然表面上是一种个人主义,但这一看法无疑使他的思想简单化了。另一方面,在中国,嵇文甫之后有学者把王艮与泰州学派当作王学左派,甚至认为王艮的思想中具有革命的萌芽。在当代学者中,龚杰是这种看法的继承者之一。但是,他也指出王艮把“尊道”与“尊身”作为统一体。《王艮评传》,2001)王艮说:“身与道原是一件”,“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很清楚地表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概念都不能圆满地描述王艮的思想。毋宁说他是有意通过调和二者来超越这种对立。

王艮最重视的经典是《大学》。《大学》提出如下这种序列:以修身为本,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是王艮思想的出发点。《大学》的“格物”被王艮理解为“安身”。吴震教授认为王艮的“安身论”是

他在思想史上的独特贡献,《泰州学派研究》,2009)并可以称得上是他的思想中对现代人最有价值之处。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批评王畿与王艮说:“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盖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目前学术界对此一般不认同,而认为王艮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于贝勒(Übelhör)认为受禅宗影响的只限于他的教学法。(Übelhör,1986)不过,禅宗的教学法跟禅宗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禅宗的哲学认识理论和实践是无法截然分开的。龚杰认为王艮所受的民间宗教的影响比佛教大,譬如罗教可能对王艮更为重要。但是罗教来自佛教,假如罗教有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说佛教因素有可能已植根于王艮的思想中。

无论如何,王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不过,他是否代表儒学的宗教化?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讨论的一个前提是,王艮之前的儒学传统不能被称为“宗教”,或者不具备宗教色彩。假如使用宽泛的宗教定义,把具有一定信仰的哲学思想、情感、行为实践与社会活动都包括在内,儒学传统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中世纪印度教的巴克提运动(Bhakti movement),启蒙时期犹太教哈西德派的民间虔信,都是值得参考的例证。笔者认为,应该对王艮及泰州学派与相关的历史现象做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第四期简报

文史研究院同仁与校内外学者从2010年始组成“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旨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和探讨,相互启发,促进研究课题的深入。

2011年1月19日第四期研习班上,邓菲副研究员报告目前的研究《妙画通神——有关唐宋时期图像观念的思考》。她首先讨论了唐代以及唐以前画史、画评中有关绘画作品逼真而引发错觉、幻觉的记载,提出图画与现实在特定场景中存在着界限的混淆。以此为楔子,她谈到类似记载中流露出“妙画通神”的观念,即成功的艺术作品可能具有与天地自然感通的能力,从而产生神异事件。她认为,这种理解与看待绘画的方式,不仅是一种赞誉画家成就时的模式或格套,也流露出汉唐以来人们在观念层面对图像的理解方式,即图形、绘画、雕塑都可以被赋予生命力,变幻成真。这种观念有可能源于早期的感类理论,超越因画作逼真而使观者误以为真的写实功力,而具有了类似巫术的神秘能力。通过分析画史以及志怪文献中关于“神

画”的材料,她还探讨了由图像的感通能力所引发的肖像禁忌,并提出这类对待图像的态度根源于当时的思想体系,研究者需要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框架内思考图画的特征与功能,同时也要考虑图像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对宗教、礼仪起到了何种作用。

有关图画的理解方式,可以从历史学、艺术史、宗教学、观念史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很多方面值得作深入与全面的探讨。院内同仁及前来参会的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讨论,除有关“妙画通神”观的发展、演变外,还涉及研究中应注意各类图像、绘画的区别与分类,如何考虑宗教、墓葬艺术等不同背景下图像的功能,以及该观念与汉唐以来巫术、宗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大家各抒己见,提出许多补充和建议,拓宽了该课题的研究思路与视野。□

何钟慧

新书介绍

- 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复旦文史丛刊”第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战后的日本乃至韩国史学界,对江户时代朝鲜王朝派往日本的外交使节、通称为朝鲜通信使的研究可说是目不暇接,名副其实称得上是一门“显学”。但是,该书作者敏锐地发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对于朝鲜王朝和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来

说,汉城—北京之间的往来远较汉城—江户之间更为密切。与对朝鲜通信使的研究相比,朝鲜燕行使的研究无论是在史料的收集介绍,还是在基本历史事实的介绍方面都显得十分薄弱。

作者对燕行录和朝鲜燕行使的研究观察,建立在对十四世纪以后东亚国际关系暨交流史发展的宏观认识的基础之上,将国家间的外交以及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置于广泛的、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除了明清王朝与朝鲜的关系之外,还将其与琉球、日本乃至越南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从对朝鲜燕行使的研究入手,又以朝鲜燕行使的问题为考察整个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出发点。作者充分运用了明清王朝乃至朝

鲜和越南王朝的实录、政书、文集、旅行日记以及方志等史料,生动地勾画出一幅幅前近代东亚国家外交交涉和文人交往的图景。

该书韩文版出版于2008年,此次为中文译本,分为“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与“燕行录与使朝鲜录”三部分。除韩文版出版后撰写的第八章之外,还以附录形式收录《越南如清使范芝香撰〈郿川使程诗集〉所见清代中国的汪喜孙》一篇。

- 岡美穂子《商人与宣教师:南蛮贸易的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11月出版)



本书将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从“欧洲扩张”这一视点中剥离,作为参与到东亚海域中的一股力量来考察,考察其在这一海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如何变化,以及这一海域因为它的存在而发生

了哪些改变。具体来说,就是将澳门的中日间代理贸易即南蛮贸易作为考察对象,尝试描绘出这个时代海域景象的一个侧面。

南蛮贸易并不是简单的物品的移动和交换行为,



而是由多种人共同经营的“生活”。从前被称为“南蛮人”、后来称为“葡萄牙人”的那批南蛮贸易商,其实是由多个阶层、多个人种构成的集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宗犹太人,长久以来他们的活动因笼罩在基督教扩张的阴影下而被忽视。葡萄牙人主导的亚洲贸易网络形成的过程,也同欧洲与新大陆之间的贸易网络一样,是从1492年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新教徒遭迫害开始的,其中一支最终在澳门定居下来。本书认为,在满刺加(马六甲)以东海域活动的葡萄牙人,其实并没有背负太多的国家意识,因为他们恰恰是被国家驱逐的人。当时的史料将澳门视为在葡属印度的范畴之外,由此可见当时葡萄牙的内外意识。

本书第一章论述了葡人占据澳门之前在宁波从事走私贸易的情况,由此获得的财富为他们日后在澳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讲述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贸易海商与天主教会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第三章主要阐明了葡萄牙私人海商与代表葡萄牙公权力的定航船之间的关系。私人海商的船一度与定航船并存,但在日本1610年在长崎湾击沉了来自满刺加的定航船之后,私人海商的船消失了,原本规模巨大的定航船也分散成多艘小船,将货物分开搭载以规避风险。第四章说明长崎和博多的日本豪商如何参与到长崎南蛮贸易的投资与融资中来。朱印船贸易和南蛮贸易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也有重叠的部分。南蛮贸易的资本,不仅来自于葡萄牙商人,日本豪商的委托银和贷款也占相当比重。第五章主要讨论了面对如此复杂的资本构成,澳门当局和商人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六章分析教会在南蛮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教会通过贸易获利,另一方面当澳门的本地商人和葡萄牙公权力发生对抗的时候,以耶稣会为主的天主教权力便起到了缓冲作用。第七章揭示了日本禁教后潜伏下来的耶稣会士与来航长崎的澳门葡商的关系。第八章考察持续百年的南蛮贸易断绝的原因,以及澳门当地的葡萄牙商人对幕府断绝通商的应对措施。

总之,由葡萄牙走私商人开启的中日之间的中介贸易,虽然处在大航海时代的延长线上,但又不能完全

归入这一框架。日本史料将从澳门驶来的葡萄牙人的船记作“天川船”或“南蛮船”,商人们也被记作“天川人”。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从澳门来的人是多民族混血,并不具备葡萄牙的国家色彩。澳门葡商与葡萄牙王国以及葡印总督无论在地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分离的。澳门与果阿的官僚机构没有直接关系,是贸易商人自治运营的港市。虽然澳门葡商在国籍上属于葡萄牙,但其归属意识具有多面性。(朱莉丽)

• 邢义田“秦汉史论著系列”(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版)



台湾中研院邢义田院士的著作集“秦汉史论著系列”2011年1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分为《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与《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四册。

作者长久以来关注的课题是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学界讨论秦汉帝制的形成,强调从周代封建制没落到秦汉郡县官僚制的出现,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然而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简牍文书是秦汉官僚行政最直接的物证,大量的墓葬画像石砖和壁画则生动地反映了地方官僚的集体心态和价值观,也反映了文献中见不到的汉代社会。

《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书,收录作者讨论秦汉时期统治体制和相应价值观的三十八篇论文;《地不爱宝》与《画为心声》,分别辑录简帛研究与汉代画像方面的三十九篇专论。□

外刊撷英

《西洋古地图中的朝鲜半岛形态和中朝境界认识研究》(서양고지도의 우리나라 반도형태와 한·중 경계인식에 대한 연구), Oh Il-Whan, 国际地域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 首尔), 第13卷第4号, 2010年

本文通过分析西洋古地图中的朝鲜半岛形态、地名与中朝境界,探讨近代西方人的朝鲜地理知识以及对东亚的认识情况。

16世纪西洋古地图将朝鲜描绘成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岛国。如W. J. Blaue绘于1635年的《中国地图》里,朝鲜是名为Ins. Corai的岛国。这是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给地图制作者提供了不准确的地理信息的结果。从17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长期居住在中国和日本,因此能够提供较准确的地理信息。所以,西洋古地图上朝鲜的形态逐渐发生了从岛到半岛的变化,与之相伴的是鸭绿江、图们江以及长白山的出现。如卫匡国(M. Martini)1654年的《中国地图》描绘出较夸张的长形的朝鲜半岛,国名为Corea,京畿道为Kingki,鸭绿江名为Galo fl,且在长白山脉上画有中朝境界。而卫匡国1655年的《日本地图》中,朝鲜半岛有着较为简化的西部、东部海岸和更详尽的南部海岸,名为Corea Peninsula,各地地名是中国式发音,鸭绿江也是中国发音Yale flu,但中朝之间没有境界线。

半岛形态方面,在18世纪法、俄、英等国探索、测量朝鲜沿海之后,朝鲜半岛在地图上得到了更加准确的表现,但地名方面仍然混乱。比如,H. Moll在1714

年绘制的《中国地图》里,朝鲜国名并记为Caoliko ue Corea和Chaosien;G. de L'isle绘于1723年的地图中,名称是R. De Coree,首都名是中国式发音Chausien;而N. De Fer的地图中,首都名为Sior。

中朝境界方面,随着西方传教士开始测量东北地区,加上确定1712年长白山境界之后,中朝境界在地图上逐渐被明显、准确地绘制出来。然而许多地图上仍然出现错误,如J. B. B. D'Anville绘于1737年的《新中国地图册》中,中朝境界不是鸭绿江而是经过凤城的柳条边。不过,从整体来看,柳条境界后来在地图上逐渐退出,而由鸭绿江、图们江以及长白山形成的境界线被逐渐固定下来。作者认为,这反映出近代国境线概念取代民族文化境界概念的过程。

《朝鲜世界地图与中华思想》(조선시대 세계지도와 중화적 세계인식), Oh Sang-hak, 韩国古地图研究(韩国古地图研究学会, 首尔), 第一卷第一号, 2009年

本文通过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几幅朝鲜世界地图,探讨朝鲜人的世界观及其演变过程。研究表明,尽管这些世界地图都表现出“天圆地方”的天地观,但它们反映出的中华世界观却有所不同。

15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地图有《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在原本中国地图的基础上,放大朝鲜,画出非洲和欧洲。作者认为,该图虽然对于中华世界观有所反映,但相比之后的世界地图,它显示出更为均



衡、开放的世界观。16 世纪地图《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的区域比 15 世纪大大缩小,其原因有二:一是取代元朝的明朝领土缩小;二是从 16 世纪开始,朝鲜逐渐强化了“小中华”意识。因此,对朝鲜来说,只有中国才是有意义的地方,其他异域的意义不大。经过两大战乱(1592 至 1598 年的倭乱与 1636 年丙子胡乱)的朝鲜出于国防方面的考虑,开始重视收集、制作世界地图。因此,地图的数量有所增加,而地图上东北地区的准确度也有所提高。

17 世纪以后的地图,虽然从中国传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然而依旧未能改变朝鲜人的世界观。17 世纪民间制作的金寿弘的《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18 世纪的《天下輿地图》、《天下大总一览之图》,19 世纪的《传世宝》等地图显示出的仍然是中华世界观。值得一提的是,18 世纪以后制作的许多地图并没有反映明清易代的事实。如《天下大总一览之图》中,中原地区仍然是明时期的行政区划,只有东北地区是清时期的行政区划。这样的倾向在民间制作的地图上更加突出。17 世纪以后西方新地理知识在民间广泛传播,然而许多两班士大夫不接受现实,他们制作的世界地图仍然未能脱离中华天下观。这样的局面直至朝鲜王朝末期满港、正式接受西方教育之后才有所改变。

《宋代东亚海域上漂流民的发生与送还》(宋代東亞海域上漂流民의發生과送還),裴淑姬,中国史研究(中国史学会,首尔),第 65 期,2010 年

本文是对宋代东亚海域漂流民的初步研究。作者主要利用《长编》、《宋史》、《高丽史》、《小右记》、《梦溪笔谈》、《日本记略》、《曾巩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文献,在统计漂流民的国籍、身份、规模、漂流期、出港地点、漂着地点、送还国等的基础上,初步分析漂流民发生的背景、各国对漂流民的态度及认识。

研究表明,当时漂流民的主要发生地是中国的明州、高丽的济州岛和日本的对马岛。这主要是因为元丰以后,宋朝确定明州为通往高丽和日本的唯一港口,之后明州成为宋朝的对外贸易中心。宋人漂流到高丽或日本的情况并不多,相对而言,高丽或日本人漂流到中国以及日本与高丽之间漂流人的情况更多一些。作

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宋人的航海技术高于高丽和日本。漂流民的身份主要有使者、居民(包括商人)、僧人、军人等。当时高丽使者的漂流期大部分在 9 月份;宋朝送还高丽漂流民的时间大约在 5 月份到 8 月份之前,由此可看出,宋朝是利用季风送还漂流民。

各国对待漂流民较为友善。如宋朝一方面为维持跟高丽的友好关系,对漂流民给予优待,并妥善安排送还;另一方面,因担心伪装的漂流民及其间谍活动,往往先查明身份才帮助其回国。宋朝用两种方式送还高丽漂流民:一是由前往高丽的宋商带回,二是交高丽使节带回。此外,在东亚各国送还漂流民和进行其他海域交流的过程中,对马岛和济州岛发挥了地理上的优势。漂流到日本各地的高丽人,经由对马岛送还高丽。济州岛则成为宋朝与日本往来的中转地,并成为高丽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前沿地区。如北宋嘉祐年间,济州岛人漂流到苏州崑山县后,在当地学习新的造船技术。

整体看来,中世纪的东亚海域,在正式的漂流民送还制度形成以前,各国之间已经有了较为友好的漂流民送还的实践。

《清代中韩读书人的交流与文字狱——以〈乾净衞会友录〉为中心》(清代한중 지식인 교류와文字獄——《乾淨衞會友錄》을 중심으로),Song Won-chan,东亚文化研究(韩国语言文化学会,首尔),第 47 集,2010 年

本文是对夫马进《1765 年洪大容的燕行与 1764 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的批评。

洪大容的燕行记《湛轩书》所收录的《乾净衞会友录》,是洪大容在北京与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笔谈的记录。严诚、潘庭筠与洪大容笔谈时,为情流泪。此时,洪大容劝他们控制感情,并且告诫他流泪乃妇人所为。对此,夫马进提出,抑制“情”与“情爱”是洪大容等朝鲜文人的理想,它来自朱子学的影响。而与此相反,中国士大夫却重视“情”与“情爱”的世界。可见,朝鲜和中国士大夫在“情”、“情爱”、“人情”的理解、回应上有明显的不同。



作者通过分析《乾净衙会友录》中当事人的性格、笔谈场所与时代背景,对夫马进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严诚、潘庭筠本身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而身处文字狱频繁的乾隆时期,一直很压抑,这次只是因为遇到异域知己而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已。

另外,洪大容和之后的朝鲜使者在与中国人笔谈时常常使用白话文,作者认为这是当时朝鲜士大夫从明清白话小说中学到的。

《燕行路的文明史意义——以17世纪初柳梦寅的散文为中心》(燕行路의文明路의 위상 검토,그 의의와 한계-17세기 초 柳夢寅의 산문을 중심으로), Lee Sengsu,韩国语言文化(汉阳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首尔),第44集,2010年

燕行路对朝鲜的历史意义一直为学界所肯定,它甚至被称为给朝鲜供应文明的大动脉。但本文通过柳梦寅的出使赴明经历,对燕行路的利弊重新做出了评价。

作者通过分析柳梦寅的散文指出,虽然当时中朝之间已经有了密切的往来,然而朝鲜士大夫对中国仍然不够了解,或只有错误的了解,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很无知。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由于明朝对燕行路的管理极为严格,燕行路看似开放,实际上只是极为有限的一条通道而已;二、明朝不允许留学。这些政策直接影响了朝鲜人的知识接受途径与方式,朝鲜两班士大夫只读书籍而不学习中文会话,因此只能写外交公文,而公事交流都要依靠译官,朝鲜也很难出现客观、全面了解中国的中国通。

作者认为,大多数朝鲜士大夫仅通过书籍认识中国,而书籍代表的是观念、抽象和过去,一旦最终达到饱和状态,就打乱了他们对于他者(中国)的正确认识,甚至还影响到他们对自我的正确认识。结论认为,朝鲜只依靠一条狭窄的燕行路与外界交往,燕行路的世界就是朝鲜人的世界,因而它限制了朝鲜人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燕行路同时具有开放性与封闭性。

《中国贵族制和“封建”》(中国貴族制と『封建』)渡辺義浩,《東洋史研究》第六十九卷第一号,2010年

在比较史方法论中,日本学界常常会提到有关中国国家体制的两个概念——“郡县”和“封建”,为了避免概念的过度抽象化,必须对中国“封建”论的特征及其历史背景做明确的考察。作者指出,如果要对贵族制有深入的理解,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阐明贵族制正统化的过程,文章选取的角度是将中国贵族制置于“封建”的关系中予以考察。

文章回顾了日本贵族制研究中六朝贵族与隋唐贵族制的不同。其中,内藤湖南重视“郡望”,堪称以乡里社会来考察贵族之嚆矢;其后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的“中世说”,并从乡品和官品的角度做了对应说明;谷川道雄也从乡里社会来阐释贵族制;川胜义雄从“豪族共同体”的角度进行阐释。六朝贵族论以乡里社会为视角,隋唐贵族制论则以身份制为着眼点;前者集中于贵族的形成期,后者集中于贵族的崩坏期。

随后文章概括了三到九世纪以两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贵族的五种属性:1)具有统治阶级的特性,对农民有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权力;2)世袭国家官位,属于政治上的统治阶层;3)有“士”的优越身份;4)承担文化责任,有文化上的优越性;5)对皇权的自律性。概言之,贵族是一种以独占文化价值为基础的社会身份,而以世袭权力为标志的贵族制则是国家身份制。贵族与贵族制应该区分开来。

作者认为,两晋南北朝是封建时代,将作为国家身份制的贵族制予以正统化的“封建”逻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中较为多见。唐代贵族不再世袭,并非因为九品中正制被科举所取代,而是因为贵族制——基于世袭爵位的“封建”——已经终结了。

中国的贵族制既不是官僚制也非封建制,而是由皇权确立的身份制。作者揭示,将形成于社会身份层面的贵族和作为国家身份制的贵族制分开来考察,是贵族制研究的深入。这一中国特有的“封建”形式,在中世世界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将是今后比较史视野中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中国”的抬头——明末文章格式中的国家意识》
(『中国』の台頭——明末の文章様式に見る国家意識の一側面) 岸本美緒,《東方學》第一百十八辑,2009 年

在帝制中国时代,当文章中出现与皇帝或皇室相关的语句时,书写者必须以“抬头”的方式表示敬意。不过,明末的公文与出版物中,“中国”一词的抬头却是独特的现象,在明前期和清代的文献中基本不曾见到。

作者回顾,“抬头”制度始于秦代,但在汉代的碑文和简牍中才逐渐确立,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制度日趋严密,直到清朝达到顶峰。《钦定科场条例》曾对科举中的“抬头”作出严格规定,后乾隆年间又颁行了《科场简明条例》,对应“抬头”的语句以及违反后的处罚程度作了进一步细致规定。相形之下,明代的《洪武礼制》并没有对此进行罗列。万历四年(1576 年),礼部对“抬头”的形式开始明确化。由此可以说,明末在“抬头”上的规定逐步趋向统一。作者以明末法律注释书籍中收录的公文为例进行了说明和概括。

明清相关的文献中并没有将“中国”一词列入必须抬头的行列,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用梁启超的“知朝廷不知国家”(《中国史叙论》,1901 年)来说明。

作者集中考察了外交文书以及与对外战争相关的奏章,揭示了明代“中国”一词抬头的现象中蕴含的朝贡和对外抗争两大历史语境。前者案例为《历代宝案》第一集,为琉球外交公文集;后者案例为《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的兵部奏稿。具体来说,一方面,原有的以朝廷为中心的垂直型广域秩序已经崩坏,中国正处于以实力决胜负的世界中,而不得不产生一种迫切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抬头”这一形式不可与上下秩序相分离,也就是说,即便在实力争战之际,夷狄也

不可能与中国处于对等地位,否则即为僭越。作者认为,“中国”一词抬头正体现了上下秩序中一贯的“一元秩序像”与诸种势力相斗争而产生的“多元世界像”之间既紧张又并存的关系,也反映了明末的国家意识。

《明朝皇子与道教礼仪》(Ming Princes and Daoist Ritual) Richard G. Wang, *T'oung Pao*, Vol. 95, 2009

目前的道教研究特别关注朝廷和道士之间的关系,而皇子在促进当地宗教如道教的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以道教礼仪及其实践为考察中心,试图揭示明代众皇子对道教的扶持对于理解这个时期的道教具有决定意义。

在对明皇室及其支持道教的政策作了简单的概述后,作者考察了宫廷“神乐”机构中的道教因素,如南京“神乐观”以及地方道观中举行仪式时的情况。随后文章把皇子分为三类分别讨论,认为,他们坚持道教信仰并积极支持地方的宗教活动,极大地促进了道教自身文化与宗教身份的提升与巩固。同时道观以及仪式也为其提供了一种宗教氛围和宗教体验。此外,皇子参与的道教礼仪与实践的差异也反映了当地社会不同的宗教需求。他们积极投身道教活动的行为应该放在当时朝廷官方宗教政策的背景下来看,如嘉靖年间,道教是明朝官方支持的宗教之一。作者也试图展示皇子在官方宗教政策与民众兴趣之间的调解作用。

最后作者指出,在明朝道教的研究方法上,学界已经出现了人类学与定向研究的取向。在理解地方社会和道教关系的问题上,应广泛运用传统历史资源如碑文、文集、方志、索引等,探索以历史文献学的方式来活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黄普基、朱坤容 摘译

博士后论坛

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以明清鼎革期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陈波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

自1644年清朝入关迄至1683年台湾郑氏政权覆灭，是满清统治者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天命攸归与牧民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可称之为“明清鼎革”期。这一时期的日本与朝鲜都已确立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基于夷夏之辨的观念不认同清朝入主中原，为此积极搜集有关情报，以因应可能发生的华夷秩序重新调整的变局，从而留下有关明清鼎革的大量记载。

朝鲜与清朝之间确立了朝贡关系，岁岁遣使北京，留下了关于派遣燕行使的大量记载，其中以燕行录为主，而《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同文汇考》等大型官修史籍也多有涉及，笔者将这类文献总称为“燕行记录”。与朝鲜王朝通过燕行使节直接获取对华情报不同，日本当时主要藉由长崎唐通事口头询问来日的“唐船”乘员，获知有关中国的消息与情报，并加以“和解”向幕府呈报，这种经过和解的有关中国声息的口述概要，习称“唐船风说书”，目前大部保留于日本江户幕府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所撰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一书中。

燕行使的派遣与风说书的采录及其制度化，就朝鲜与日本而言，在获取中国情报方面具有相似的性质与功能，从而使得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书这两种文献

在内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看待。二者对于明清鼎革之中国既有从旁观者角度出发的敏锐洞察，也不乏基于华夷观念的历史想象。截至目前，将二者内容进行细致对比，探究其历史叙事的关联及差异，并追询这种异域文献所呈现的“华夷变态”与“明清鼎革”历史实相之间区别的研究似乎尚付阙如，而笔者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做一些初步尝试。

笔者通过分析认为，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书所体现的华夷观念虽表面相似，而实则有本质区别。燕行记录所折射出的“尊周思明”观念缺乏自外于朝贡体制的内在动力，而是将朝鲜置于继承明朝道统的定位，这使得朝鲜可以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想象，同时心安理得地向清朝贡不辍。但“华夷变态”则不同，它是一种欲取中国而代之的道统自立宣言，成为江户时代日本构筑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思想源泉。事实上日本后来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蚕食、攻略甚至吞并与占领，莫不发端于此种偏执狂热的华夷观念。所以在阅读燕行记录及唐船风说书这两类史料时，不能仅仅看到二者描述的相似性，还需认识到二者在历史叙事上的巨大差异，这种总体把握对于细部研究的深入，或亦不无裨益。□

Ph. D. Program in Asian Religion, Art and History

Introductio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has seen increasing discussions about Asian, in particular East Asian cultures. Many distinguished institutions are diminishing the boundaries among area studies of China, Korea, Japan, India and Iran etc., but favor a cross-cultural or integrated approach whereby “East Asian” or “Asian” studies have become the norm. In this context of fading lines among disciplines and broadening vis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es, we launched the Ph. D. Program in Asian Religion, Art and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Inaugurated on March, 2007, the Institute (IAHS) is a center for original and innovative work supported by the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 is committed to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focused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1) viewing China from the periphery, (2) understanding and critiqu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Sinology, (3) interweaving cultural history, (4) visual materials about China stored abroad, and (5) synthet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 thought and art.

Admission/Courses

This is a four-year program which begins in each September.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December 31 of the preceding academic year. It is open to applicant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overseas applicants need to pass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The program aims to provide scholarly training in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to students who would embark on a career of comprehensive Asian studies, and to develop a broad vision in research, the capabil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awareness of issues as well as expertise in Asian especially Chinese religion, art and history.

Besides language courses, other basic courses of the program include: “Methodologies of Asian History”, “Asian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Art”, “Primary Sources on Asian Art, Religions and History”, “Studies on Western Region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Pre-Modern Ages” etc. The program also incorporates a set of optional courses.

Excellent doctoral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will be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s exchange students in the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and Program,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Tokyo.



Faculty

The Institute has a group of faculty members who can offer class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their fields of study spanning from India to Japan and covering various disciplines from history, religion to art. At the same time, some courses are to be taught by faculty from the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and Program,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Tokyo.

I Advisors

Ge Zhao-guang Professor,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 culture and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include *Cha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Tao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 6-9 Centurie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2 vols), among which some have English, Japanese or Korean translations. Besides receiving several prestigious book awards in China, he has been visiting professor at universities in Japan, Belgium,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was appointed the Princeton Global Scholar in 2009.

Li Xing-ming Professor. He specializ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 and the medieval Chinese funeral art. Publications include *A Study of Tang Tomb Murals* and *Corpora of Chinese Tomb Sculpture, vol. 4,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o-Edit).

Rui Chuan-ming Professor.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eval China and foreign regions,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China,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Publications includ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ymbols of China and the West, A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Study on Ancient Turkic Inscriptions and *Study on Manicheism in the East*. Translated works includ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Emile Durkheim) an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 (ed. UNESCO).

II Other faculty members

Xu Quan-sheng (Ph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cademic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Liu Zhen (PhD. University of Munich; Indology), Dong Shao-xin (PhD.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relations), Sun Ying-gang (PhD. Princeton University; social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medieval China), Zhu Yi (Ph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tate rituals in Tang-Song China), Deng Fei (PhD. University of Oxford; art history in Song-Yuan China), Wang Xin-lei (PhD. Fudan University; China-Korean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history) and Zhu Li-li (PhD. Shandong University; relations between Ming China and Japan).

Contact

Web: www.gsao.fudan.edu.cn

www.iahs.fudan.edu.cn

Mail to: Jin Xiuyi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PRC
200433

Tel./Fax.: 86-21-5566 5284

E-mail: wsyjjy@fudan.edu.cn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1.01—2011.03)

• 2011 年 1 月 17 日

举办博士后的开题、中期考核会议。朱坤容博士开题报告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元素与世界意义——以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论”为中心》，陈波、於梅舫、黄普基博士分别做中期考核报告。

• 2011 年 1 月 18 日

评审 2011 年度报考我院“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方向的考生材料。

• 2011 年 1 月 19 日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英国文学教授韦格睿(Gary Wihl)与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教授陈绶琪来访,与我院葛兆光教授、李星明、董少新、朱湓、孙英刚、邓菲、朱莉丽等研究人员座谈并讨论合作事宜。

“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四期研习班,邓菲副研究员做题为《妙画通神——有关唐宋时期图像观念的思考》的主题报告。

• 2011 年 1 月

《史学月刊》2011 年第 1 期发表葛兆光教授《“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与朱湓副研究员《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两篇论文。《复旦学报》2011 年第 1 期发表李星明研究员的论文《佛法与皇权的象征——论唐代帝陵神道石柱》。

本月,葛兆光教授三种书评文集陆续出版,分别为《看澜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本无畛域——书评七篇》(海豚出版社)与《穿行书林断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1 年 2 月 7 日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赖瑞和教授来访。

• 2011 年 2 月 15 日

韩国首尔大学宗教系李妍承副教授来访,李妍承女士曾于 2009 年在我院做访问研究。



• 2011 年 2 月 26 日

葛兆光教授赴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开题论证会议。

• 2011 年 2 月

葛兆光教授《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同时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繁体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月27日号刊出关于此书的访谈《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与疆域》。

• 2011 年 3 月 1 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宗教系博士生李珊娜(Johanna Lidén)来我院做为期两月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王良的宗教特色、背景与影响”。

• 2011 年 3 月 2—6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学术访问,并与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正教授、副所长大本康教授商议与普林斯顿东亚系三方合作办会、人员交流以及翻译出版等事宜。3月4日,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做题为《“中国”何在?》的讲演,这是三方合作协议下举办的交流讲演之一。3月6日,在京都大学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拜访我院国际评鉴委员夫马进教授与学术委员末本文美士教授,征询他们对文史研究院未来发展计划的意见。

• 2011 年 3 月 5—10 日

芮传明特约研究员与孙英刚副研究员赴福建福鼎、霞浦考察,收集有关民间宗教和摩尼教的资料。

• 2011 年 3 月 9 日

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来访,伍跃教授是“复旦文史丛刊”第七种《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一书的中文本译者。

• 2011 年 3 月 10 日

举办第三十场小型学术研究会,许全胜副研究员做题为《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报告,刘震副研究员主持。

• 2011 年 3 月 11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做题为《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学术报告。

• 2011 年 3 月 15—16 日

举行 2011 年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招生面试,院内七名研究人员担任面试专家,其中博士生导师分别为葛兆光教授、李星明研究员、芮传明研究员。

• 2011 年 3 月 17 日

“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五期研习班,刘震副研究员做题为《梵文本〈赞法界颂〉研究》的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刘承功与校长顾问叶绍梁来院调研,葛兆光教授介绍了院内近况。

• 2011 年 3 月 17—18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参加哈佛中国基金会(Harvard China Fund)在哈佛大学上海中心举办的“人文学科与高等教育”研讨会(Human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Workshop),主持第三场“高等教育与媒体中的人文学科”的讨论,并向来宾介绍了我院“从周边看中国”项目的情况。

• 2011 年 3 月 21 日

刘震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做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

• 2011 年 3 月 22 日

刘震、董少新、孙英刚、朱溢、邓菲等五名研究人员参加“复旦大学人文基金青年学者科研激励计划成果



交流座谈会”，杨玉良校长、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词。

• 2011 年 3 月 22—30 日

复旦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举办“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做题为“执拗的低音”的首次讲演，分四场，分别是《“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心力”与“破对待”》、《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与《“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此次系列讲演由我院承办。

• 2011 年 3 月 23 日

新进博士后人员、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胡绍宗副教授进站报到，合作导师为李星明研究员。

• 2011 年 3 月 25 日

举办第二十三期博士后论坛，陈波博士做题为《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以明清鼎革期为中心的初步考察》的报告。

• 2011 年 3 月 25—26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参加“居士佛教：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 (Lay Buddhism: An Old Issue Viewed in New Perspectives)，并提交会议论文《政治场域与宗教空间：六至七世纪长安的佛教社邑》(Political Arena and Religious Space: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the 6-7th Century Chang'an)。

• 2011 年 3 月 27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做一个月的访问研究。

• 2011 年 3 月 31 日

举办第三十一场小型学术研究会，访问学者李珊娜做题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 (1483—1541) 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的学术报告，历史系邓志峰副教授主持。□

金秀英 整理

勘 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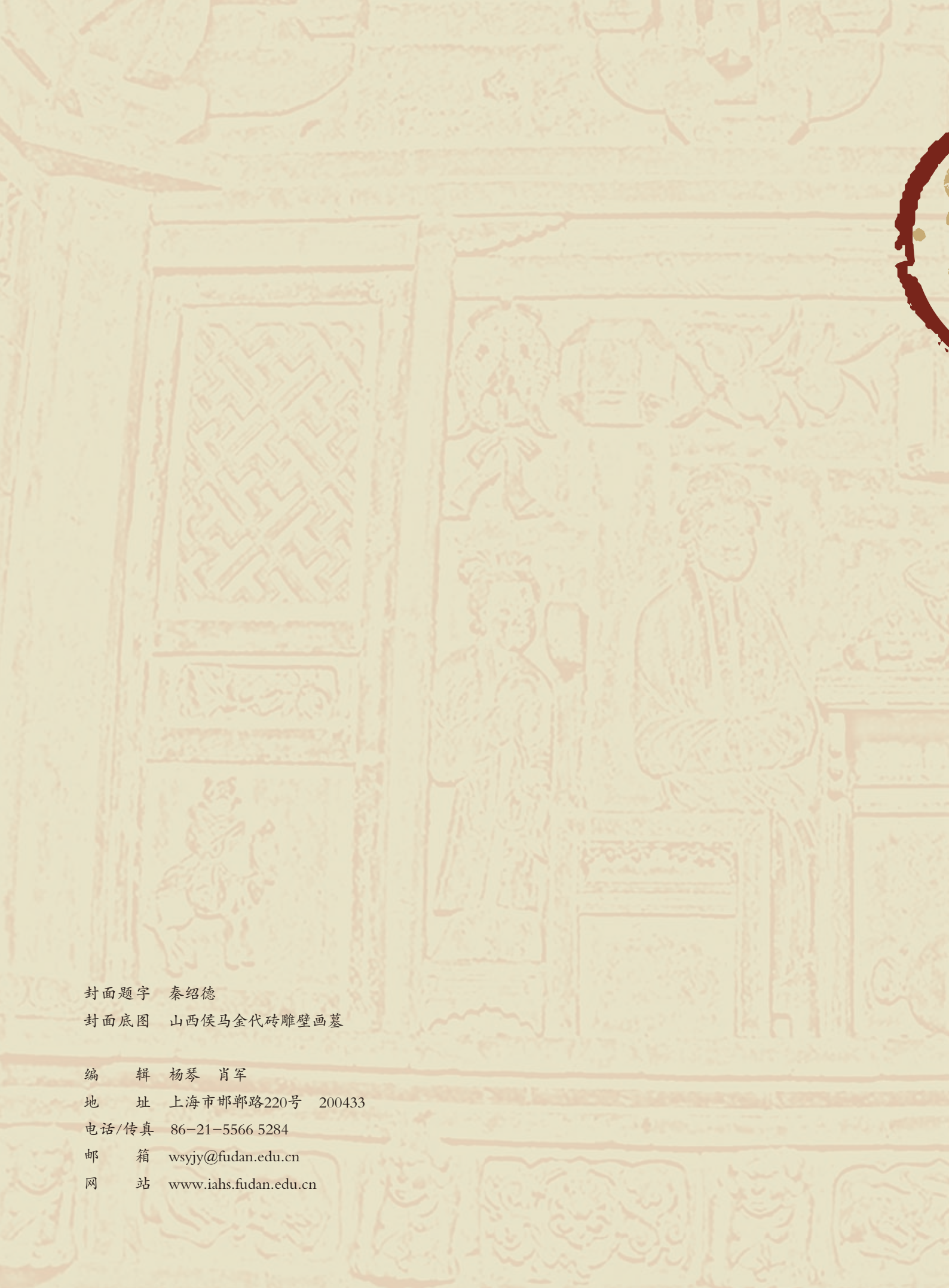
2010 年第 3 期 (总第十五期) 页 6, 四、唐代佛教的思想史和政治史, 参会人“土屋太佑 (日本新潟大学经济学部)”, 应为“土屋太祐先生 (日本新潟大学经济学部)”。特此致歉。



本季度资料室新购进一批日文书籍，其中包括《朝鲜史》、《江户漂流记总集》、《五山文学新集》等文献资料，《西嶋定生东亚史论集》、滨田耕作、黑田俊雄、牧野巽等人著作集，以及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等近两百册。



2011年1月，资料室收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及东亚研究所赠送的一批英文学术专著，包括 Susan Naquin, Benjamin Elman, Stephen Teiser, Kern Martin, Chou Chih-p'ing, Robert Bagley 等学者涉及政治、文化史、宗教、艺术史等多个领域的著作计41册。



封面题字 秦绍德

封面底图 山西侯马金代砖雕壁画墓

编 辑 杨琴 肖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jjy@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